

清水江研究丛书

第一辑

张应强 / 主编

# “插花地”： 文化生态、地方建构 与国家行政

## 清水江下游地湖乡的 个案研究

谢景连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谢景连** 湖南怀化人，民族学博士，副教授。2007年9月至2009年7月，在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师从杨庭硕教授学习生态民族学相关理论知识，获民族学硕士学位；2011年9月至2014年6月，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从张应强教授学习历史人类学相关理论，获民族学博士学位。现为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西方人类学史、世界民族志、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的教学，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发展与研究。主持省厅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5项。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目前聚焦于清水江区域社会、西南“插花地”相关问题的研究。

清水江研究丛书

第一辑

张应强 / 主编

# “插花地”： 文化生态、地方建构 与国家行政

清水江下游地湖乡的  
个案研究

谢景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承蒙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11&ZD096）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山地、流域与族群社会：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变迁研究”（17JJD8500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类学视阈下的黔湘桂省际民族地区‘插花地’问题及治理创新研究”（19YJC850022）

贵州省教育厅社科基地项目“飞落湖南的‘插花地’：对天柱县地湖乡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D2014256）

## 资助

## 总 序

以一条江来命名一套研究丛书，确实需要做些说明。

贵州东南部的清水江，是洞庭湖水系沅水上游支流之一，亦名清江。清雍正年间设置的“新疆六厅”，其中就有因江而名的清江厅。历史上因江清而名的江河或相应治所不在少数，至今湖北西部仍有清江；民国初年改清江厅置县，也因与江西清江县重名而改名剑河县。清水江之名则渐至固定，用以指称这条源出贵州中部苗岭山脉、迤迤东流贯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多个市县的河流。

清水江是明清时期被称为“黔省下游”广阔地域里的一条重要河流，汇集区域内众多河流，构成了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逐渐过渡的一个独特地理单位。特别是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且雨热同期的自然条件，非常适于杉、松、楠、樟等木植的生长。是以随着明代以来特别是清雍正年间开辟“新疆”之后的大规模区域经济开发，清水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以木材种植和采运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历史过程。以杉树为主的各种林木的种植与采伐，成为清水江两岸村落社会最为重要的生计活动，随之而来的山场田土买卖、租佃所产生的复杂土地权属关系，杉木种植采运的收益分成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发生于地方社会的重大事件等，留下了大量契约文书及其他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民间文献。基于对清水江流域整体性及内在逻辑联系考虑，我们把这些珍贵的主要散存于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文民间历史文献统称为“清水江文书”，这一命名得到

“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

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采用。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与其说这种整体性及内在逻辑联系是一个客观事实或既有认识，毋宁说是一种理论预设，正需要通过精细个案研究去加以探索与论证。这可以说是组织这套丛书的一个最单纯直接的因由，也是本研究丛书出版希望可以达致的一个目标。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对于清水江流域的深度关注和系统研究，吴泽霖先生或为开先河者，1950年代完成调查并成书的《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份地区苗族的婚姻》是重要代表作。而后1960年代由民族学者和民族事务工作者所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直接在清水江下游的苗侗村寨收集整理了一定数量的民间文书，并于1988年整理编辑出版了《侗族社会历史调查》。正是在这些已有的学术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笔者开始关注这个区域的材料和问题，并在2000年真正进入清水江流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如果说两三年成稿、后经修订出版的《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是对区域社会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综观式考察，那么其后继续推进的相关学术工作，包括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以及指导研究生在清水江两岸及更大地域范围的苗乡侗寨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等，则可视为既带有某种共同关怀，又因田野点不同或研究意趣迥异而进行的学术尝试。

或许，“清水江研究”可视为一个学术概念，一种其来有自的学术理念传承发展的研究实践，是围绕共同主题而研究取向路径各异的系列工作成果，也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密集布点开展深入田野调查，同时充分兼顾历史文献收集解读的研究范式探索。事实上，要想对这些论题多样、风格各异的研究进行总括性的介绍与评述，不仅徒劳而且多余，其间确有误解误读乃至抹杀不同研究独到见解及学术贡献的可能风险。因此，围绕以“清水江研究”名之的这套丛书，余下的就是这个研究群体在实践、交流、互动过程中遵循

的原则或认可的价值，以及一些不同研究渐至形成的共识，可在此言说一二。

当我们把“清水江研究”看作一个整体，自然首先是清水江流域可视为一个整体。流域绝非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流域的历史亦非单纯的自然史，而是与人类的活动交织和纠缠在一起。是以当我们在清水江流域不同地点开展田野工作，这些工作本身即包含了某种内在的共同性。这是显而易见的，构成了我们以为必然存在的整体性的最基础部分。这是流域内干支流水道网络形成的自然条件影响（支持或约束）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面。其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我们也不难看到，特定地域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或者说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性。如果说“新疆六厅”的设置，标志着地域社会进入王朝国家的政治体系，那么以杉木贸易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社会生活，更是充分地表现出一种共同性和一致性。当原有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在共同面对王朝国家的制度性介入，以及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适应市场机制的制度规范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社会文化层面的某些同步改变与整合。这是一幅生动而丰富的历史画卷，如果说国家治理和市场经济共同构成了画卷材料的经纬或质地，那么杉木的种植与采运则是清水江故事的基本底色。

这样的一种整体性也具体体现在每个基于精细田野调查与深度文献解读的个案研究中。诚然，每项具体研究都自成一体，都有其自身的整体性，且这种整体性是由各自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关材料的收集和运用所决定的。无论是聚焦山居村寨与人群以杉木种植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生活，还是着重考察临江村落木材采运贸易的制度运转或人群竞争；也无论是对一个特定苗寨侗村日常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与剖析，还是多个相邻相关村寨复杂人群构成及相互关系的历时性比较；亦无论是从婚姻缔结及婚俗改革等传统主题入手探讨社会文化变迁，还是洞悉传统社会组织延续与转

“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

型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意义赋予等，都无不明显呈现出各自的整体性。实际上，这也都是由整个流域整个区域的某种内在整体性所决定的。特别是当我们把“清水江研究”这样一个概念，扩展到超越了清水江流域，而包括了相邻的都柳江流域、舞阳河流域乃至下游的沅水干流等其他一些相关地区的时候，背后所考虑的其实也正是由清水江研究所引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某些内在的关联性或者说一致性。

编入“清水江研究丛书”、主要基于不同乡村聚落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的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国传统人类学关于乡村社区研究的一种延续。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被誉为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先生曾强调，社区研究应结合空间的内外关系和历史的前后相续。正如有学者在回顾和反思后来的一些研究时所指出的，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存在不无偏颇的情况，即将中国乡村社区看成是不太受外界影响的一个整体，以致缺乏对乡村社会的历史性以及内外关系体系等的整合性考虑。在这个意义上，“清水江研究丛书”所涉及的不同村寨，虽说它们都是清水江流域整体的某些局部，但这样的一些局部，又是镶嵌在整个区域社会乃至中国社会文明的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的。故此，这些研究实践所带出的关于清水江流域的总体认识，同时提供了看待整个清水江流域如何进入中华文明系统的独特视角。这绝非简单的局部与整体关系、局部如何说明和构成整体、整体又如何局部里面得以体现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所践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如何兼顾内外关系和过去现在的方法论视角。

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已无须再予强调，富有挑战性的是不同的田野点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清代以来的各类民间文献。当结合这些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以了解某一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及特定人物时，不仅作为史料的各种文献的建构过程值得进行深入的发覆，而且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以及历史事件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等，都成为田野调查时需要高度的敏感性才能有所觉察和了解的。也因此之故，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的历史民族志就成为“清水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它不仅是书写村落社会历史甚或“创造”其历史的独特方法，而且是探索和丰富历史人类学取向的有学术积累意义的研究实践。相信这些立足于精细个案及丰富材料，又富含区域和全局关怀的非常有层次感的民族志，都从不同的侧面充分展现了人、社会、自然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清水江研究丛书”作为一个研究团队在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十分难得的试验场的系列工作成果，不能不说也得益于非常系统而完整的清水江文书的遗存。这一由民间收藏、归户性高、内在脉络清晰的民间文书，显然不只具有新史料带出新问题这种陈旧观念所能涵纳的一般意义，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完整看待一个地方社会发展历程的全新眼光和别样视野，带给研究者一个回到历史现场的难得机会，帮助我们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非常生动具体的过去，回到文书所关涉的那样一些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在清水江文书呈现出来的文字世界里，既可看到地方人群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也可见到在与文化他者的复杂关系中对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因此之故，结合深入细致的历史田野工作，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清水江文书中包含的极具地方性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观念，同时也获得了探索特定地域社会动态发展极富价值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

不难发现，在不同专题研究的民族志材料中，均以具体而鲜活的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为中心，并且饱含研究者真实而丰富的同情之理解。我们的研究都建基于一个个既有共性又个性鲜明的村寨的田野工作，尤其是其中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探寻国家制度影响、了解不同人群互动交融、理解社会文化历史建构的根本着手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田野工作的深度不仅关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社会的了解认识，更直接影响到立足历史文化过程生动细致描述的

“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

历史民族志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展现。可喜的是，在“清水江研究丛书”中，在研究者为我们呈现的栩栩如生、极富画面感的历史情境的描述中，不仅可以见到研究者与对象社会人群真情实感的互动与共鸣，还饱含了研究者对对象社会人群思想观念和表述习惯的充分尊敬和理解。或许，正是这样细致有力量感的民族志决定了这些研究的基本学术价值。至于是否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有关西南地区甚或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新视角和新范畴，以及在这样带有方向性的学术努力中贡献几何，则作者自知，方家另鉴。

张应强

2018年初秋于广州康乐园马丁堂

# 目 录

## CONTENTS

序 一 杨庭硕 / i

序 二 罗康隆 / iii

绪 论 / 001

第一章 走进地湖：自然、生态与人文 / 049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上的“孤岛” / 049

第二节 坝区中的“丘陵”：自然地理上的“孤岛” / 060

第三节 湿地中的“山地”：生态系统上的“孤岛” / 063

第四节 侗文化背景中的“苗区”：  
民族文化上的“孤岛” / 070

第二章 从“蛮地”到“插花地”：地湖身份的变化 / 078

第一节 作为“蛮地”的历史及其记忆 / 078

第二节 从湖广“内陆”到湘黔“边地” / 083

第三章 插花地“主人”的自我意识：以地湖吴氏宗族为例 / 097

第一节 祖先谱系与观念表达：吴氏地湖“开基”  
与“入住” / 097

第二节 国家权力的地方性延伸：吴姓宗族的维系 / 112

“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

第三节 “鳌山祠”：吴氏宗族的文化象征与礼仪中心 / 127

第四章 成型与延续：文化生态与国家行政 / 140

第一节 博弈之主体：国家、地方行政与乡民 / 141

第二节 地方行政与地湖插花地的认同：  
以天柱建县为例 / 146

第三节 国家视角下的插花地：以明清黔省插花地的  
议处为中心 / 154

第五章 插花地整饬之殇：民国地湖插花地清理拨正历程 / 188

第一节 “清理拨正”与地湖插花地的幸存 / 190

第二节 “田土编丈”与“一田两赋”悲剧产生  
(1943 ~ 1946) / 197

第六章 权利“息壤”及博弈：地湖插花地的内在张力 / 250

第一节 同村中的“外村人”：制度下的权利差异 / 250

第二节 “簧老爷”：民国地湖地方势力的崛起 / 254

第三节 同“公”不同“籍”：地湖人群认同的  
多面向性 / 260

第四节 “皂角壕”与“地湖土地纠纷”事件：插花地  
产权纠纷的当下演变 / 264

讨论与结语 / 280

附 录 / 309

参考文献 / 320

后 记 / 338

## 图表目录

- 图 0-1 插花地类型 / 022
- 图 1-1 街左街右分隶湘、黔两省的地湖街 / 054
- 图 1-2 湘、黔两省粮田犬牙交错 / 055
- 图 1-3 甄家墓湘、黔两省“友谊桥” / 056
- 图 1-4 房前坎后两家人分属两省 / 058
- 图 1-5 横跨湘、黔两省的岜溪口“鸳鸯桥” / 059
- 图 1-6 地湖得名的那坵“壶形田” / 061
- 图 1-7 地湖赶场日街上待卖的杉树幼苗 / 076
- 图 3-1 地湖开基始祖“世德公”墓碑 / 099
- 图 3-2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吴修祠、吴修复、  
吴顺珍等封禁字约 / 110
- 图 3-3 1987 年修撰的《吴氏族谱》 / 113
- 图 3-4 地湖吴氏鳌山祠图 / 130
- 图 3-5 地湖岩鼓新修的“吴氏宗祠” / 132
- 图 5-1 天柱县第二区与会同县各乡边区详图 / 192
- 图 5-2 地湖重编田土坵形图“果字段” / 213
- 图 5-3 地湖重编田土坵形图“珍字段” / 215
- 图 5-4 前会同县土地陈报处编丈后经  
天柱县政府函请注销坵段略图 / 230
- 图 5-5 勘划湖南会同、黔阳与贵州天柱省界地图 / 239
- 图 5-6 民国三十五年会勘地湖联保重编经界图 / 248
- 图 6-1 同治七年李宏礼卖子杉木契 / 268

“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

图 6-2 同治八年吴杨氏卖杉木契 / 269

图 6-3 光绪六年吴顺亲分关文书（一） / 272

图 6-4 光绪六年吴顺亲分关文书（二） / 272

图 6-5 民国三十三年杨光兰卖苦力养木契 / 274

表 1-1 2014 年以前地湖乡各村民小组户数统计 / 051

表 1-2 2013 年地湖乡各年龄段人口统计 / 052

表 5-1 天会边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果字段坵号” / 214

表 5-2 天会边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珍字段坵号” / 216

表 5-3 湘黔交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  
“会同朝字五段（1）” / 217

表 5-4 湘黔交界地湖重编田土登记册  
“会同朝字五段（2）” / 220

表 5-5 财政部湖南省会同县田赋管理处广坪征收处所辖地湖  
及毛公冲一带飞地粮户正良册 / 230

表 6-1 本案原主吴 D. F. 家族世系 / 267

## 序 一

杨庭硕

《礼记·王制》有言，治国之道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属历代延续的至理名言也。然而，对于地域如此之广、民族如此之多、自然与生态背景迥别的中国而言，虽说历代王朝都坚持这一治国理念，但“教”该如何“修”，能够修到何种程度？“政”该如何“齐”，又能齐到何种程度？“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每个王朝都得有所坚持、有所变通，层层相依之后，总不免体现出诸多行政管理体制的例外，“插花地”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行政辖境插花地实情，历代学人早就做过互有区别的探讨，但远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行政管理上的弊端，主张大刀阔斧予以消除；有人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博弈的产物，只要这样的博弈有其深层的社会基础，插花地就不可能消除；还有学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与历朝政府的管辖实力直接关联，政府难于管控则任其以插花地的方式存在。但到了当代，随着行政管理能力的加强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历史的残局完全可以做出一次性的清除。然而不管是上述哪一种观点，它们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误读和误判。事实上，插花地的成因极其复杂。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插花地得以确立的社会原因本来就不相同，插花地得以延续的社会背景也互有区别。单从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原因入手得出的结论都很难普适于我国境内不同类型的插花地成因。

“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

谢景连博士不落前人俗套，锐意进取，立创新说，以生态民族学所倡导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为依据，对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这片延续数百年的插花地做了深入的剖析。从中注意到该乡自然和生态背景与周边属于会同县的侗族村寨有所区别，同时还注意到地湖乡的居民不仅与贵州省天柱县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而且还具有家谱上的血缘关系；并以这样的文化生态认识为基础，回顾了贵州省天柱县的行政建制历程，明代的卫所建制，撤所置县，清代将天柱县从湖南划分到贵州，等等。作者正是基于对这片插花地社会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最终用事实说明插花地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生态成因，还有非常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以至于乡民、基层行政建制乃至国家都不得不承认或者默许插花地的长期存在。

这一研究结果能突破前人认识的窠臼，在西南各民族杂居的聚居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足以从新的立场和角度解读插花地的成因和延续机制，也足以为今后行政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又能推动生态民族学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实属难得的用心之作，可喜可贺。但愿该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谨此序之，并愿以此激励年轻的学人，敢于力排众议，多创新说，那么生态民族学的发扬光大也就可期可待了。

2018年4月28日于吉首大学图书馆

## 序 二

罗康隆

记得 1987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时，单位分配我编写《地理志》，在编写《地理志》过程中首次接触到“插花地”这一概念。“插花地”有时也称为“飞地”。谢景连所著的《“插花地”：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与国家行政——以清水江下游地湖乡为个案研究》一书中所涉及的这块“插花地”，是贵州天柱县插入湖南会同县的一块“飞地”，也是当年我编写《地理志》所关注到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距离我的老家也不远，我对这块“飞地”的情况还算比较熟悉。1993 年到湖南怀化工作，很多同事经常与我谈起这块“飞地”是怎么回事。因此，对“飞地”的研究也是很有趣的领域。谢景连博士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学术兴趣开展了对“插花地”的研究。

“插花地”是指相邻行政机构的辖境，在空间分布上伸入甚至被包裹在其他行政辖境范围之内的特殊区段。对这样的特殊区段，学术界统称其为某行政机构的“插花地”，即古之所谓“犬牙之地”、“华离之地”和“瓯脱之地”。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在全球语境下，“插花地”的概念恐怕就不一样了。比如美国之于阿拉斯加，再比如欧洲殖民国家之于殖民地。澳大利亚学者 Brendan R. Whyte (2002) 归纳出全世界飞地的类型。日本学者吉田一郎 (2006) 对全世界“现存飞地”和“历史上的飞地”做了纵向的比较研究。当然这样的情形不在该著作讨论之列。于此就不